

国外劳动关系经典著作译丛



常凯 主编

INDUSTRIAL RELATIONS: A MARXIST INTRODUCTION

劳 资 关 系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

(英) 理查德·海曼 (Richard Hyman) 著

黑启明 主译 于桂兰 校译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国外劳动关系经典著作译丛



常凯 主编

INDUSTRIAL RELATIONS: A MARXIST INTRODUCTION

劳 资 关 系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

黑启明 主译 于桂兰 框译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资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 / (英) 海曼著；黑启明主译. —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国外劳动关系经典著作译丛

ISBN 978 - 7 - 5045 - 7047 - 5

I. 劳… II. ①海… ②黑… III. 劳资关系-研究 IV. F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8852 号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惠新东街 1 号 邮政编码：100029)

出版人：张梦欣

*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0.5 印张 181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读者服务部电话：010 - 64929211

发行部电话：010 - 64927085

出版社网址：<http://www.class.com.cn>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4954652

国外劳动关系经典著作译丛

编审委员会

主任 常 凯

副主任 杨河清 姚先国 崔 勋 王玉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桂兰 王玉君 李丽林 乔 健

朱学敏 朱 飞 张红兵 杨河清

杨伟国 易定红 姚先国 常 凯

崔 勋 黑启明

丛书总序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劳动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劳动关系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能否和谐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而如何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提供理论支持，则成为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我国关于劳动关系的学术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主要是政策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90 年代以后，面对日益突出的劳动关系问题，学界开始有人借鉴和引进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理论和方法，试图对于中国的劳动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其中 90 年代中期出版的以《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当代中国的劳动问题》一书为代表的著作，即是这种尝试的产物。但这种研究还仅仅是中国劳动关系学术研究的艰难的起步，不仅参与人数有限，而且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加之当时劳动关系问题还没有达到急迫的程度，所以这一研究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大的反响。

到 2000 年前后，随着劳动关系问题日益加剧，劳动关系开始成为学界的关注问题。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劳动关系研究不再局限于劳动部门或工会部门，而成为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对象。这一阶段出版了一批劳动关系译著和著述。这些著述开始更多地介绍和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关系理论和制度，研究的视野开始放宽，研究的内容也开始深入。而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和实施，劳动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同的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都在用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来对劳动关系问题做出解释。这一期间，出版了大量的劳动关系教材、专著和研究论文。应该说，中国劳动关系研究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时期。

尽管劳动关系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这些著述大多是介绍性或应用性的研究，真正的理论著作和文章很少，而能够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成果更是难得一见。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除了揭示劳动关系本质规律的理论需要一个过程，还与中国的劳动关系研究缺乏学术基础和学术传承直接有关。与西方的劳动关系研究相比，中国的劳动关系学科刚刚建立，劳动关系研究目前还没有脱出起步的阶段。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研究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或学术领域。这门学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资本论》是两部最经典的劳动关系研究著作。在西方，劳动关系研究和工会研究是不可分的。在 20 世纪之交的时候，韦伯夫妇出版了他们的《工商业主义的历史》(A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和《产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对英国的工商业主义进行科学分析。而著名经济学家康芒斯 (John Commons) 在他 1925 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中进一步阐述了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着外部社会主义阵营和内部劳资冲突的双重挑战，劳动关系的稳定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维持和继续的关键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关系理论在此间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其标志性的著作即是邓洛普 (John Dunlop) 在 1958 年出版的《产业关系系统》(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这本被称为战后最为经典的劳动关系著作所提出的劳动关系系统理论，主张运用资本主义自身的机制，在体制之内来处理劳资矛盾，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所制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政策，极大地缓解了劳资矛盾，使得一度趋于激化的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冲突逐步缓和，从而成功地抵制和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危机。

邓洛普之后，美国学者桑德沃 (Sandver) 在 1987 年提出了自己的企业劳动关系分析的理论模型。桑德沃理论模型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其出版的《劳动关系：过程与结果》(Labor Relations: Process and Outcomes) 一书中。该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和阐述了企业劳动关系的一些具体影响因素以及劳动关系运作中紧张冲突的解决及其后果。桑德沃的理论模型在企业劳动关系研究上至今被广泛应用。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的经济发展直接影响了产业关系的发展。学界围绕很多国家的产业关系系统是否“转型”展开争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寇肯等人 (Kochan, Katz, McKersie) 出版了《美国产业关系的转型》一书，系统阐述了其“转型”的观点，并且提出了策略选择理论框架。而英国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在这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海曼 (Hyman) 所出版的《劳资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

析框架》(Industrial Relations: A Marxist Introduction)一书，则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新时代的劳动关系予以了一种全新的分析。

上述的在西方不同时期的几本比较著名的劳动关系著作，仅仅是西方劳动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基本代表性著作。但是仅就这几本著作而言，已经能为我国的劳动关系研究提供许多理论上的启示和借鉴。遗憾的是，上述这些著作，在中国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外大部分没有中译本。特别是目前在国际劳动关系学界广泛认同的劳动关系系统理论，由于这一理论的产生恰逢东西方“冷战”对峙时期，当时的国内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了解。而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面临着市场经济国家许多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劳动关系便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这些国外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劳动关系问题的解决以及对中国劳动关系学科的建立，都有着直接的意义。

为此，我们急切需要系统、全面地翻译介绍西方劳动关系的经典著作，以便我们了解、学习、借鉴国外劳动关系的理论成果。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方能推进中国劳动关系研究的理论深度和提高劳动关系研究的学术水平。上述这些著作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从不同的理论层面探析劳动关系问题的特点和规律，主张通过某种路径在体制内调整国家各个层面的劳动关系。了解、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目的是要开阔眼界，是要看看人家是怎么说的，以免闭目塞听、囿于井底之见，还以为是创立了人类的新思想呢。一个国家的学科发展，必须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成果，特别是具有国际性特点的市场化下的劳动关系研究，更不可能脱离人类历史的一般经验和价值而另辟蹊径。如果连市场化下劳动关系最一般的特点都不了解，恐怕没有资格来奢谈中国特色。因为所谓的中国特色，只有在国际比较的语境中才有意义。

关于劳动关系经典著作的遴选原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要根据劳动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选择每个历史阶段上的代表性著作或者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二是市场反应。作为著作应该是市场上经久不衰的著作，这也是著作本身的学术地位和社会价值反映。三是对中国的适应性。这些著作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方法，要对中国劳动关系的研究有所借鉴。

翻译出版“国外劳动关系经典著作译丛”的计划，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推进劳动关系学科建设计划中的一个内容。这个计划最初完全是为了适应劳动关系的教学而提出的。最初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员，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的教师、博士生、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而后这个计划的参与者又扩大到其他高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首批翻译出版的这几部著作，主要

集中于英美国家的学者，今后还将逐步扩大到不同国家和不同语种的劳动关系著作。

我们期望，本套译丛的出版，能够为国内劳动关系专业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学术借鉴，为企业和政府的劳动关系实践者提供高端的理论支撑，为劳动关系的学习者提供经典的辅助读物。总之，为中国劳动关系的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专业文献。

常 凯

2008年6月20日写于京西时雨园

(1) 常凯，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会长，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分会副会长。

致中国读者

得知我的《劳资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一书将出中文版，非常高兴，也对翻译者和出版者为此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这本书是我 30 多年前写的，当时的我刚刚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在劳动关系方面的知识也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国家。后来，我对其他国家不同劳动关系模式的了解大为增进，如果今天我再写这样一本类似的话，我会提供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视角。

但是，世界本身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存在着对抗。那些明明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却羞于称自己为资本主义；而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东方国家，在我看来，却与马克思设想和为之奋斗的社会类型，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在一些人看来，今天，资本主义已经独霸天下了，前苏联的解体，中国采用的市场经济规则越来越多，都证明了马克思是错误的。在我看来，事实正好相反。当遭遇到一个不同的、可以替代它的东方社会模式（即使是被歪曲的）的对抗时，西方政府愿意，的确也是急切地，强化了对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和野蛮行为进行了某些限制。现在这些约束又被解除了，在西方，我们看到不公平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没有保障，工作压力和强度越来越大。在全球范围内，富裕的北半球对贫穷的南半球剥削得越来越严重。资本主义使环境恶化——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中还极少有人意识到紧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过程的一个表达，它预示着死亡和破坏，特别是在那些已经被严重剥夺的国家里，这种死亡和破坏采取了最为极端的形式。

所以，马克思在 19 世纪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分析，其意义对于今天甚至比我在 1975 年写作本书的时候更为重大。在全球范围内，为生存而工作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了争取收入、工作安全、体面和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似乎经常以失败而告终，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新的抵制。

我把这本书献给中国的工人阶级，支持他们新的奋斗，并希望他们可以引导世界进入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邪恶的战役中。

理查德·海曼

2008 年 3 月 28 日

前　　言

劳动关系的研究和分析通常开始于这样一种假设：在雇主与工人之间建立稳定有序的劳动关系是正常的且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很多文献大都明确建议雇主如何去维持一支温顺驯良的劳动力队伍。而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和工人自觉行动的关注，却与那些广泛流行的劳动关系观点大相径庭。可以说，就“劳动关系”这个概念本身，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时而剧烈、时而缓和的、永久冲突神圣化了的委婉说法”（Miliband, 1969: 80）。^①这并没有阻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许多相关文献所展现的对劳动关系神秘化和辩护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者们倾向于在认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只对正统流行观点的特定方面进行不成体系的和消极的对抗。没有人尝试运用更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一种整合的可供选择的方法。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勾勒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把“劳动关系”作为社会生产关系整体中的一个因素来把握。本书主要是关注理论、勾勒框架，所以并没有试图去提供一个关于劳动关系经验细节的广泛调查或者其他作者的观点——虽然本书部分涉及了这两个方面。

本书的学术观点得益于两方面。无论自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有多么深刻的理解，都得益于他们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卢卡锡、葛米西和其他许多人的；得益于多年来在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与许多好同志的讨论；也得益于参加过斗争的工人自身的经验教训。我所知道的关于英国劳动关系的知识大部分是从老师、同事、学生和工会主义者那里学来的。既然我在这本书中关注了林林总总、互不相同的学术观点，因此在这里表达我对休·克莱格（Hugh Clegg）的感激是非常合适的。多年来，他精到的学识和不留情面的批评对我助益良多，这使我更加犀利地阐明我那些引起争议的观点。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许多同事对于本书基本观点毫无保留的批评也使我受益匪浅。

^① 本书的参考书和引用都注出了作者和出版日期，必要的地方还加注了页码。相关出版物的详细信息见书末的参考文献。

在为初学者阐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观点时，我遇到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至今也不敢声称已经圆满地解决了。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远非是一元化的，但是大多数解释的分歧和分析的微妙之处在此不得不被忽略。第二个是概念性的。那些形成学术分析基本框架和日常讨论（而且不仅仅在劳动关系领域中）的概念范畴经常是肤浅的，而且不容许对关键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进行充分的论证。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一些经常是奇怪的甚至是初学者难以理解的概念和术语。鉴于本书的导论性质，我试图尽可能使用日常用语；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责怪我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书末的“进一步阅读指南”给出了本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的更多样化和进一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解决途径。

也许本书很快就成为多余的了，但是首先会激发出更多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劳动关系学术成果；其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废除**现存的“劳动关系”。

理查德·海曼
1975年2月于考文垂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劳动关系是什么	(6)
第二章 工会结构	(22)
第三章 工会政策与工会民主	(45)
第四章 资本与劳动关系	(64)
第五章 意识形态与政府	(82)
第六章 基层工会组织与行动	(102)
第七章 冲突与协调：劳动关系的辩证法	(126)
进一步阅读指南	(138)
参考文献	(143)
词汇表	(149)
译后记	(152)

导 论

直到最近，劳动关系通常被看做是社会分析中最不令人振奋的领域之一。在集体谈判过程成为报纸电视高度关注的焦点之前，它通常表现为雇主与工会之间关系的严重破裂，尽管这远非常态。姑且不论那些劳动关系涉及的专业领域，这个学科当中严肃认真的学生并不多见，而且学术同行们常常带着困惑的眼光看待他们。

在最近的几年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的一些原因会在后面讨论到。劳动关系的参与者过去常常因媒体忽视他们的活动而感到遗憾，而今天他们却很有可能由于受到过多的关注而抱怨。工会、雇主和政府三方之间的关系业已成为社会与政治问题的中心。大学里的劳动关系学系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这样的课程里——在学位、文凭甚至是 GCE^① 层次——这个学科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本书试图提供一个简短的和可读的劳动关系导论，以适应不断增加的各类学生的需要。同时，本书也考虑到了一般读者——尤其是为那些在工厂、车间或者办公室工作的人们提供分析调查问题的材料。

本书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理论分析。可能这需要一番解释，因为在这个国家“理论”是一个忌讳的字眼。托尼说过，英国人“对理论没有好奇心，把基本的东西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更为关注的是道路的状况而不是他们在地图上的位置”(Tawney, 1961: 9)。理论被看做是人们溺爱地放在手扶椅或者象牙塔里的东西，是人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但是，理论不能与行动分离，也不能与之相反；没有理论人们就不能行动，因为理论是一种观察、理解和规划的方法。现实世界是如此复杂，它包含了那么多的现象、关系和事件，以至于我们只有在关注一些方面的同时，忽视另一些方面，才能够理解它。我们从那些熟悉的社会生活元素中归纳出普遍原理，并根据这些普遍原理试图对那些不熟悉的进行解释和说明。我们对事件未来的进程进行预测，根据这些预测选择其中的一种行为过程而不是另外一种。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在一些原

① GC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指英国普通教育证书。译者注。

则和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和选择：严格地说，正是理论才使之成为可能。那些以其实用主义为荣和声称自己不受理论影响的人，只是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潜在观念和潜在假设。他们依据随机的直觉而践行，而大量的想法和信念，因为显而易见，未加理性慎思而被当成“仅仅是常识”而已。^①然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不总是行动的最好基础，特别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传统观念也因此而逐渐过时。相反，那些试图在更广阔背景中探讨具体事件的明确的理论讨论和论证，能够指导和帮助行动：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更高层次的实践行动。

怀疑公开的理论化，在劳动关系领域中特别普遍。没有几个管理者会认为理论分析有意义，因为这种分析不能提供明显和快速的回报。尽管在其他问题上与管理者存在分歧，但是，绝大部分的工会主义者也赞同这种观点。恩格斯在一个世纪前写道：“尽管有工会这样的强大组织，但对所有理论的漠不关心，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一直缓慢前行的主要原因之一”（1958：652）。目前，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正如下文所论证的，这种对理论漠视的后果对工会主义是极其有害的。

甚至在劳动关系的学术研究者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情愿明确集中于对理论的探讨。有关文献为工会、雇主组织、协商制度、工资决定过程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经验性描述，但这些对英国劳动关系的纯粹经验性或者描述性的解释如此复杂，以至于令学生们总是迷惑不解。绝大部分劳动关系领域确实发生的理论论争关注的范围有限：举例来说就是薪酬制度对于争议类型的影响，或者工会增长的决定因素。然而把劳动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构建一套系统完整和广泛适用的理论框架的尝试，却是罕见的。在过去几年中，关于劳动关系理论的一般性文章，几乎围绕着劳动关系系统的概念而进行写作的，这已成为一种时尚。本书的写作是确信上述的这种支配性的理论方法并非具有特别的说服力，它确实歪曲或者掩盖了劳动关系的重要方面，而且确信一个更为令人满意的理论框架是能够构建出来的。因此，本书从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探讨开始，这种讨论为以后各章的更为具体的分析设置了理论语境。

显而易见，本书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种描述需要一些详尽的细节。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常常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松散和空洞的，而另一方面是狭隘和教条的。直到马克思 1885 年去世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他创作了鸿篇巨著，广泛地分析和解释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艰巨

^① 凯恩斯（Keynes）的评论经常被引用：“那些认为自己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践者，常常是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1936：383）。”

的任务，而且马克思仅仅能够完成他的人生规划工作的一小部分。然而，马克思理论不仅仅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鼓舞人们付诸行动。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运动，然而，这种贴着马克思主义标签的运动，却经常与马克思理解社会的方法的精髓背道而驰。在一个极端上，纯粹主义的派别或者政党成员坚持认为他们自己的这种或那种“神圣文章”观点是唯一真理；在另一极端上，许多作者已经在机会主义地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使他们自己的观点获得一种激进的形象。

由于这种混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权威性的定义。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完成了他绝大部分的著作，因此这些著作不能被机械地应用到今天的世界中；采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运用一种独特的视角理解世界。最为简洁地讲，这种视角可以用不会出现太多误解的四个词来概括：总体性、变化、矛盾和实践。总体性就是指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的社会现象是相互关联的，没有任何社会生活领域能通过孤立的分析而使人满意。举例来讲，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社会的生产关系——将会塑造社会的政治制度、传统的思想方式、家庭关系等。因此，一个社会形成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特定的因素影响其他因素，一些制度和程序带来的影响是强有力的。

系统的概念常常加强对社会现实的误解。许多写过社会系统或者劳动关系系统的人暗指，讨论中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和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对于基本的结构性变化有抵抗力；常常有人假设与这些关系有关的人享有共同的信念、价值和目标，而这些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却坚持认为，社会和经济系统的任何静止不变的模式都存在着危险的歪曲。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动态的：任何时间点上存在的事物都是过去的行动和关系的产物，因而也包括了未来发展的潜力。公正而论，任何令人信服的社会动态分析，都必须包含一种历史的维度。

在解释社会变化时，矛盾的观念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观念，否认不同的程序和制度能够协调一致、整合为一体，而是认为这些是在相反方向施加力量。因此，马克思论证道，由按小时或者按天雇佣劳动力的雇主所指挥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的增长，与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协调。后者反映了盛行在一个封建的、主要是农村的社会关系，在这个社会里，市场竞争严格地受到限制，而且权利和义务主要是由习惯所规定的；它们是与在市场中最低价买进、最高价卖出的市场原则不一致的，如果没有明确作为经济合同的一部分，就不用考虑社会义务，这些都激发了资本主义工业的活力。后果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里，构成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导致的常常是社会暴力

和政治革命。然而不和谐的社会力量继续发挥作用：举例来说，工厂内和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关于生产组织的决策是由独立的企业家以分散化和非计划化的方式作出的；而其结果是不断发生的繁荣与衰退的“商业周期”。识别出暗含在今日劳动关系中相似的矛盾力量并不需要什么能力；而且经常发生的紧张的社会冲突是自然的产物。

基于这种背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理解“实践”这一最重要的概念的含义是可能的。^①“人类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马克思写道，“但是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它，不能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它，只能在他们直接遭遇的、特定的和由前代流传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958：247）。马克思一直强调社会生活的物质属性，特别是在经济关系的结构中，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着人类生活方式的组织选择的可能性。因此，他对“乌托邦主义者”持批评态度，乌托邦主义者为一个理想社会设计蓝图，完全没有考虑到在现实物质世界中如何建设。然而马克思从没有认为物质技术和经济制度机械地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也不认为人类是非个人力量的玩偶。相反，人类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存在着可供选择的领域，即使这种选择仅仅在明确的限制下发生；而且当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和生产潜力扩大时，这些限制倾向于减弱。（今天，如果给出新的社会和工业的组织形式，在使工作自身文明化的同时，满足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需求是可能的；这一点会在最后一章谈到。）

矛盾的社会力量的存在为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提供了主要的有利条件。在工业革命时期，增长着的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能够改变传统社会，因为经济和技术的变化趋势朝着有利于它的方向运行。今天，对结构变革提供最大潜力的社会矛盾是生产活动的相互依赖的集体特征与经济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之间的矛盾。那些实际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中一起工作的人们（作为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手工工人、技术工人或者其他范围的白领工人），以不同方式承受这种矛盾带来的苦难，这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到。结果，他们对创造新的产业和社会管理的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兴趣，这种新的产业和社会管理的结构，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社会特征并且代替了当代经济控制中常见的反社会形式。现代生产需要的这种自发的合作为工人们集体参与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这种变革所需要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追求这种目标的有意识的组织。劳动关系的存在模式究竟对这种意识和组织有多大影响是本书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

^① Praxis，常常不严谨地被译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键的意义，但同时又引起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在此没必要追究这些；深入的讨论见（Avineri, 1968: ch. 5）。

不存在简单划一的和轮廓清晰的“劳动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书试图构建一种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分析框架，并必然地受到其他人把这种观点应用到劳动关系领域的努力的影响。但同时，它来源于一个特定时代的个人的洞察和阐释。这些决不试图作为一种决定性陈述或者分析，实际上，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样一种观点也许是荒谬的。因此，我将给出一些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在阅读中，读者会遇到不同的解释，并获得一些比本书更详细的实证信息。就像这本书的标题标示出的，这本书计划提供一种导论性的指南，如果它能帮助读者作出他或她自己的判断的话，就算达到其目的了。